

晚清南浔私祀乡贤及其地域精神史建构

刘正武

(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党校 文化研究所,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晚清绵延百余年的南浔文人私祀活动,在遴选祭祀乡贤的同时,也在努力构建着地方精神史,并由此创造了南浔历史上最辉煌的学术黄金期。这既是底层文人对自身独立人格坚守的结果,也是构建贫寒士人共同价值的自觉。

关键词:晚清;南浔;士风;私祀;精神史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2-0076-10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2.014

On the Private Sacrifi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gional History of Spirit in Nanxu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U Zhengwu

(Cultural Institute, Party School of Huzhou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Huzhou, Zhejiang, China 313000)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scholars' private sacrifices lasting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in Nanxun county helped constructing the local history of spirit as well as selecting the accountysages and created the local academic climax, which was the result from the persistence of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ordinary scholars and their self-awareness of the common values as well.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Nanxun county; scholarly demeanor; private sacrifice; history of spirit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在中国古人看来,唯有军事可以与祭祀这样的大事等量齐观。祭祀之所以被看重,是因祭祀活动具备风化社会、教化人伦,甚至巩固政权、建构历史的作用。皇朝可以赖此建立秩序,深化对底层社会的思想渗透;而地方神道教、私祀乡贤,放大书写某些历史人物和细节,从而也清晰描绘出地方精神史蓝图。

道光初年的湖州南浔镇,一个貌似偶然的事件引发创立的文人私祀活动,断续绵延百余年之久。晚清民初,南浔有八十年的蚕丝外贸辉煌^①,在整个社会浓厚的逐利氛围和繁华的商业活动背景下,南浔私祀群体追求风化社会,矫正恶俗,显示出底层文人对自身独立人格的坚守和构建贫寒士人共同价值的自觉,这不仅引导了学风,并创造了辉煌的学术成就。

一、私祀活动的缘起

南浔地处湖州之最东界,毗邻嘉兴、苏州。出土文献可证这里西晋可能已有定居者^{[2]卷3,1a-b},但晚至南宋淳祐末期人口集聚、商业繁荣才建镇^{[3]卷26,14b}。唐代开始朝廷不断下诏,令各州县建先贤祠^[4]。南浔的先贤祠到清中期依然没有建立起来。这可能既受制于地方狭小,外来人口聚集后观念难以统一,以及行政权力机构没有此义务(先贤祠只要求建到州县),或者其他种种原因。总之,道光初年的南浔镇上,只有佛、道等宗教场所和私人家族性质的宗祠,还没有先贤祠。

清道光八年(1828年)正月,南浔文人公祭盛朝勋的事情再度被提起。盛朝勋在此前一年冬天突然

收稿日期:2016-11-21

作者简介:刘正武(1969—),男,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地域历史和文化研究。

①一般认为,南浔丝业外贸发达是从1850年开始到1930年止。见文后参考文献[9],第180-183页。

去世,其励志勤学和醇厚德行深为众文士折服。特别是其挚友金锡桂对其离世伤痛不已,并为此积极活动大家举办公祭。同人孙燮认为,既然举办公祭,就应把前几年去世的施国祁和邢典二位先生也一并祭祀。一贯慷慨任事的沈登瀛表示赞成,并着手筹办祭品,金锡桂负责起草祭文。正月十日,公祭活动在妙境庵举行。参与者十人,计有沈登瀛、孙燮、金锡桂、许旦复、吴钧台、吴汝雯、纪庆曾、沈垚、纪磊、丁桂。祭祀活动结束后,大家一起在沈登瀛家饮宴,吟诗唱和,欢聚而散。^①

道光九年(1829年)正月十五日,当孙燮再次积极筹备举办乡先辈公祭时,张秋水先生来了。张秋水名鉴,号秋水,南浔耆宿,比前述十人年龄都大,跟已经去世的施国祁、邢典是同辈,于是理所当然地成

为主祭人。在他的建议下,增祀了“南浔三先生”之一的杨凤苞,以及清初孙淳以下的好多南浔名士。这一年参加公祭的,除了吴钧台远出不在外,上一年参与者都来了。许旦复还介绍了陆鸥波、徐印泉来参与,于是参加祭祀的人达到十二人。祭祀结束,众文士聚孙燮家,诗酒唱和,欢宴而散。^②

道光十年(1830年)正月十日第三度公祭。大家认为不可由个人出钱搞活动,于是分摊钱物,交给妙境庵的僧人,请他主办公祭活动,并大幅增祀乡先辈。张秋水先生自然还是主祭人。公祭活动结束后,精擅丹青的张秋水泼墨挥毫,画了一幅《精庐小集图》,以记录这次公祭活动,十一位参与公祭者跃然纸上。沈登瀛为此题跋,描述此次公祭活动的情况,并且详细列出受祭乡先辈名单,一共三十五人(见表1)。^③

表1 第一批受祭乡先辈名单

受祭者	生活时代	身份	主要经历	著述举隅
史博	宋末元初	布衣	元初交辟不就尤邃于《易》 ^{[3]卷12,3b}	
庞仆	宋末元初	宋秀才,元翰林修撰	贾似道聘为塾师不就。元初为翰林修撰,奉敕修史 ^{[3]卷12,3b-4a}	《五湖狂叟集》
张洪	明初	举人,宁波府教授	淹贯经史,研精古学,疏财重义,周急扶危 ^{[3]卷12,7a-b}	
余津	明初	寓贤,布衣	性颖敏,一目辄成诵,不肯为举子业,专为歌诗 ^{[3]卷12,2b}	
赵金	明中叶	隐士	工诗文,善画,尤精医。屡征不起 ^{[3]卷12,8a-b}	《医学经略》
赵隼	晚明	布衣	力学攻诗,顷刻千言不竭,教授里中,人无知者 ^{[3]卷12,8b-9a}	《乍醒草》
袁袞	明中叶	寓贤,进士,兵部主事	触时贵,贬戍湖州。尝过南浔,题诗壁间 ^{[3]卷12,1a-b}	《胥台集》
纪濂	明中叶	举人,刑部河南司	馆严嵩家,理义自闲,嵩败不及 ^{[3]卷12,10b-11a}	《戒子帖》
李乐	明中叶	寓贤,进士,尚宝卿	在任布袍蔬食数年如一日,以清直称 ^{[3]卷12,2a-b}	《见闻杂记》
董嗣成	明中叶	进士,礼部郎中	以出位妄言削位。以气节著,士论多之归 ^{[3]卷12,13b-15a}	《董礼部集》
董斯张	晚明	监生	家门衰落,屡试不第,结社联诗,著述自娱 ^{[3]卷12,20b-21a}	《吹景集》
董说	明末清初	秀才	早年受业张溥、黄道周之门入复社,明亡出家为僧 ^{[3]卷12,21a}	《丰草庵集》
朱国桢	晚明	进士,内阁首辅	魏忠贤擅政,佐叶向高,多所调护。后引疾归 ^{[3]卷12,15b-18b}	《明史慨》
朱绅	晚明	秀才,中书舍人	接连抗疏,遭廷杖毙 ^{[3]卷12,17a-b}	
朱鉴如	晚明	中书舍人	甲申之变为闯贼所执,不屈死 ^{[3]卷12,17b-18a}	
王毓耆	晚明	寓贤,诸生	跌宕不羁。受业刘宗周,明亡上书劝宗周自裁,并先投河死 ^[6]	
张隼	明末清初	寓贤,诸生	复社名彦。经史百家皆得旨趣。死于《明史》案 ^{[3]卷37,20b}	《西庐诗草》
孙淳	明末清初	寓贤,生员	奔走以襄集社,义不辞难,千里必应。晚居南浔 ^{[3]卷14,3a-4a}	《蕲草》
黄周星	明末清初	寓贤,进士,户部主事	国变高隐不仕,卖文自给。年七十自沉水死 ^{[3]卷14,4b-5b}	《夏为堂集》
潘尔夔	明末清初	寓贤,诸生	慷慨有风致,能文工书。撰写了第一部《镇志》 ^{[3]卷14,5b-6a}	《涉江草》
周篆	明末清初	寓贤,布衣	博究经史,所作多关治体,参幕府 ^{[3]卷14,6a-b}	《说草亭诗文集》
陈忱	明末清初	布衣	读书晦藏,卖卜自给,究心经史,乡荐绅推重之 ^{[3]卷12,22b}	《水浒传后传》
张肩	清初	隐士	书法、诗词俱极迺美,善画,知天文、推步之学 ^{[3]卷13,8b-9a}	《远偏庐遗诗》

①此段落所述情节见沈登瀛撰《南林乡前辈私纪录序》。见文后参考文献[10],第8页b-第9页a。

②此段落所述情节见沈登瀛撰《南林乡前辈私纪录序》。见文后参考文献[10],第9页a-第10页a。

③此段落所述情节见沈登瀛撰《南林乡前辈私纪录序》。见文后参考文献[10],第9页b-第10页b。

续表 1

受祭者	生活时代	身份	主要经历	著述举隅
纪远	清初	县学生	少从张隽、董说游。穷愁老病,气不少衰 ^{[3]卷13,13b-14b}	《风雨吟草》
茅星来	清初	寓贤,诸生	屡绌于有司,乃专攻经史,欲著述自见 ^{[3]卷14,6b-7a}	《近思录集注》
董燠	清初	廪贡生	尝为松陵书院山长,有“经师人师”之目 ^{[3]卷13,17b-18b}	《行笈日涉录》
董浩	清初	举人	诗学宋人,豪迈不羁。得奇疾卧床,歿 ^{[3]卷13,14b}	《南穀集》
董丰垣	清初	进士,知县	博览群书,贯穿六经,析疑辨惑,阐极精微 ^{[3]卷13,18a-b}	《尚书大传考索》
谢洲	清初	商人	工诗古文,洽闻周见,托业贸迁,多与名流往还 ^{[3]卷13,20a}	《宋元明人诗文》
曹大斌	清初	贡生	家故贫,屋无定居,常寓市楼读书,尤精于音学 ^{[3]卷13,19a-b}	《音白黑》
王起鹏	清初	拔贡,知县	倜傥不群,诗文敏妙 ^{[3]卷13,20a-b}	《蕙如遗文》
杨凤苞	清中期	廪生	于经学、小学皆有根柢,后拔入诂经精舍 ^{[3]卷13,25a-b}	《南疆逸史跋尾》
施国祁	清中期	县学生	家极贫,中年弃举业,为人经理生业,著述甚多 ^{[3]卷13,25b-26a}	《金史详校》
邢典	清中期	县学生	家赤贫,读书谈道,旁通壬遁、医卜、星相诸术 ^{[3]卷13,26a-27a}	《学易心数》
盛朝勋	清中期	县学生	少孤贫刻苦厉学,性耿介不屑干人,务求有用之学 ^{[3]卷13,32b}	《唐述山房日录》

这次公祭活动,还确定了吴钧台、吴汝雯、孙燮、沈登瀛四名祭司,以后每年轮流负责主办祭事,其他参加的文友则只需摊一份酒钱。公祭时设置一本册子,诸受祭者各书小传于其中,参与祭祀者则列名其下以记之。公祭后饮宴,不得拇战、不得喧哗等各种禁忌,也都一一写于此书册中。公祭乡先辈的活动从此成为常例。此后,除太平天国军队占领南浔期间和战后混乱中断十余年,^①祭祀乡先辈活动持续一百多年,直到抗战爆发。

地方文人在私祀乡先辈过程中,不断陈述、阐释、互解、比照、借鉴前人行状,完美着乡先辈人格和自我人格。在历史观照中,他们寻觅自身存在的意义和自身价值的定义,从而升华了历史人物的道德文章形象,体现出地域精神史建构的努力作为。

二、私祀对象的产生过程

道光八年(1828 年)开始的晚清南浔文人私祀活动,有着极为鲜明的价值取向。该祭祀谁,如何排序,其间发生过很多争论,甚至这种争论贯穿了百余年祭祀活动的全过程。这既是一种文人团体崇仰价值的不断集约和矫正,也是个体认识不断碰撞、竞逐和渐次统一的过程。

八十年后的宣统元年(1909 年),蒋锡柙再度记录南浔乡贤祠内的人物。除了跟道光十年(1830 年)那份名单一致的之外,少了朱国桢,并在文后加以注释,说:“尚有二人未详,俟考。”^{[7]19b-20b}另外,他列出了道光十年(1830 年)以后逐渐增祀的人物(见表 2)。

表 2 道光十年(1830 年)后增祀的人物

受祭者	生活时代	身份	主要经历	著述举隅
董汉策	明末清初	隐士	清初在浔溪募勇士捍御,盗不敢犯。后以隐逸荐 ^{[3]卷13,6a-7b}	《周易大成》
张澂	清中期	举人,教谕	勤于督课,率先身教,士林称之 ^{[3]卷13,24b}	《秋畹骈体文》
纪峻	清中期	府学生	家贫,习形家言。精乐律、推步,善琴弈。旌表孝子 ^{[3]卷13,28b-29b}	《诗经异议集说》
冯鸣盛	清中期	举人,翰林院典簿	少孤,授徒以养母,工制艺,从游者甚众 ^{[3]卷13,26b}	《笥园仅存草》
温日鉴	清中期	监生	好蓄书,从杨凤苞游,有金石癖,精舆地之学 ^{[3]卷13,27b}	《魏书地形志校异》
纪庆曾	清中期	增生	笃好程朱之学,善名理,兼攻古文辞,与沈垚友善 ^{[3]卷13,32b}	《师泉经说》
张鉴	清中期	副贡,教谕	熟谙经史,肄业诂经精舍,入阮元幕 ^{[3]卷13,29b-30b}	《秋水文丛》
沈垚	清中期	优贡	经史子集罔不溯流探源。屡试不售。穷困犹恤孤 ^{[3]卷13,33a-b}	《扬帆楼文集》

①据汪曰祯咸丰八年(1858 年)写的《题精庐小集图六十四韵》诗:“惜哉九载后,祭遂辍不行。”可证私祀活动持续九年后一度中断。而吴春藻诗《祭乡先辈事偶成》说:“兵荒久缺频繁荐,数十年来又举行。”可证私祀活动中断十余年后再次举行了。见文后参考文献[17],第 644 页上栏至 645 页上栏;文后参考文献[5],第 8 页 a。

续表 2

受祭者	生活时代	身份	主要经历	著述举隅
董蠡舟	清中期	监生	贯穿经史,尤精三礼,著书甚多,兼善诗画 ^{[3]卷13,18b}	《十六国史摭逸》
许旦复	清中期	诸生	家甚贫,而不屑干求。尤其熟于史事。时或断炊,钞书不辍 ^{[5]卷21,4b}	《冬心庐诗集》
孙燮	清中期	诸生	酷嗜书籍,尝积至数千百卷。肆力于诗古文辞 ^{[3]卷13,31b}	《愈愚集》
丁桂	清中期	县学生	酷贫,取予不苟。好读书,天才豪迈,屡试不售 ^{[3]卷13,32b-33a}	《欧余山房文集》
张升吉	清中期	举人,知县	勤抚字,赈饥民。嗜研《易》理,兼善六壬数 ^{[3]卷13,33b-34b}	《樾门啸余录》
金锡桂	清中期	诸生	贫寒文士,困厄不堪 ^{[3]卷14,9b-10a}	《溪云阁吟稿》
纪磊	清中期	诸生	家贫,弱冠授徒养亲,读《易》,旁及堪舆 ^{[5]卷21,8a-b}	《周易消息》
汪曰楨	清后期	举人,教谕	邃校勘及音韵律历之学,砥砺名教,长于推步勾股 ^{[3]卷21,11b-12a}	《玉鉴堂诗集》
陈方谷	清后期	县学生	贫而尚义,授徒自给,庚申匪至,责以大义,被戕 ^{[3]卷21,3a-b}	
沈登瀛	清后期	府学生	性醇厚,外和内介。恤孤寡,急人之急,喜考史传 ^{[3]卷13,32a-b}	《深柳堂文集》

蒋锡环在这份增祀名单后,又自做注释说:“尚有五人,未协祀典”,^{[7]20a}不愿写出其名字。从文字中可以体会到他的一种强烈的情绪。他在名单前曾予以说明,先概述了私祀乡贤的缘起以及发展,归纳宗旨,说最早祭祀的乡贤,大多是山林隐逸之士,开始时祠是设在妙境庵中,咸丰初年转移至祇园寺研冰精舍,所祭祀的是“乡先辈之品学兼优者,其英显者不得与焉”。^{[7]19b}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先贤祠转移设置在了浔溪书院南偏,其地为朱氏所助,因为有地主之谊,所以朱国楨得以附祀。^①由此破例,董份也就堂皇入祀。蒋锡环深痛近时乡贤增祀名单里,有的品德未必优秀,而“学仅工制举业者”也列入其中,未免太滥。但是既然已经列入,又不便黜去。^{[7]19b}

显然,“未协祀典”的五人中有南浔镇历史上最显赫家族中最显赫官员之一的董份。董份是明末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退居林下后,富甲一方,在荒歉之年以抵债或低价收购田产、接受投献,激发民变,影响了声誉。^[8]但是根据沈登瀛、孙燮等人道光十年(1830年)的记录,朱国楨在首批祭祀名单中,董份则属于后来增祀。蒋锡环所述,或属误记,或属道咸间中断私祀而再续的时候产生的讹误。

咸丰后期汪曰楨主持撰修《南浔镇志》,没有“乡贤”一节。蒋锡环在回忆先师汪曰楨对于祭祀乡贤问题主张时说:“吾师尝云:乡贤须品学兼优而已,达者不与焉。今虽因文肃公而宽其例,以后仍宜

慎举。若既达而有功、德、言可纪者,不妨列入,否则不可滥祀。”^{[7]20a}设身处地地想,就可以理解汪曰楨在纂修《南浔镇志》回避“乡贤”的苦衷:一方面他需要那些豪富商贾出资来支持著述事业;另一方面,他又坚定地不愿意放弃文人信仰,不会曲笔奉迎颂扬德行欠佳的富豪。所以博通经史、熟谙著述体例的他,极有可能是在《南浔镇志》中故意回避了“乡贤”一节。

从前后时间差距近八十年的两份名单中可以看到,所有受祭者都在生活遭际上有过较多挫折,多数既不是“英显者”,也不是“达者”。而南浔最显赫的董氏家族成员董份,前一份名单中根本就没有,而后一份名单解释中说加入了,但是蒋锡环还是固执地不写他的名字,说是“不协祀典”。

考察南浔嘉道咸同时期人物,范锴绝对算是个奇才:其奔走川蜀楚淮经商,兼事著述,为人豪爽仗义,出入儒商二界,既脱略冬烘酸相,也不染市侩习气,^{[9]124-125}但他没有被列入私祀行列。其他比如计然,稍后的陆长春等。除汪曰楨所说的“达者不与焉”一条成为障碍外,更加重要的是谁来决定受祭者名单,受祭者与决策者之间的信息透明程度、相互密切关系。

产生这份名单的实际情形比蒋锡环所说的要曲折得多。早在道光九年(1829年)商议增祀哪些人开始,就有过争论。当时大家一致公论推举的有九人是:黄周星、董说、周篆、纪濂、董燠、谢洲、曹敦山、董丰垣、杨凤苞。^{[9]9a}

①蒋锡环的记录显然有误,沈登瀛撰《南林乡前辈私祀录序》中叙事并非如此,见文后参考文献[10],第9页b-第10页b。

纪庆曾坚持认为,应该断自清初,明代和明代以上的人不应该列入祀典。而沈登瀛和纪磊则颇不以为然。主持公祭的张鉴年纪最大,资格最老,特别提出要祭祀孙淳和茅星来,并且对大家解释:此二人虽然都不是南浔人,但是他们客居南浔,大家虽然未必尽知,却应列入寓贤行列。加上此前一年祭祀的施国祁、邢典、盛朝勋,这样已经是十四人。这一年,纪庆曾的观点占据上风,最后私祀就仅仅列名了十四个人。^{[10]9a}

到道光十年(1830年),大家决定增祀四人,分别是沈登瀛提出来的两人——潘尔夔和张肩,纪磊提出来的王毓耆,众人一致认可的董浩。当有人提议增祀朱国桢时,张鉴、金锡桂率先表示反对,认为“是举宜阐幽,达者可舍焉。”^{[10]9b}对于此说,纪磊反应非常强烈,认为虽然是私祀,实际也是公祭,应该论品学而不论穷达。他说:“所祭诸公未必有过于文肃^①。文肃之不祀乡贤,已为缺典,况里中之祭?乌可舍!”^{[10]9b}透过沈登瀛记录的这段文字的语意,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纪磊一种决绝的近乎吵架的味道。明末朱国桢有篇文章,说到南浔镇三百年来的历史人物,一个也没有被列入湖州府乡贤祠,非常遗憾。^{[11]3下}可惜品学兼优、曾贵为内阁首辅的朱国桢去世后,还是没有被列入湖州府乡贤祠。这在纪磊看来已经是很严重的失误了,如果南浔私祀乡贤还不列入朱国桢,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争论半天,决定不下来。孙燮商议于沈登瀛,认为朱文肃等应该增祀。沈登瀛请他说出道理,孙燮追溯历史,说现在我们搞私祀活动的地点妙境庵,古时候是荐福祠,也叫厚德庵,原是朱国桢家的家庵,庵的后面,原来就有“文肃祠”专祀朱国桢,现在虽然废弃,但是这可是人家的地盘。哪里有在人家土地上搞祭祀活动却忘记了地主的?^{[10]9b}

孙燮的这番理论,终于说服了沈登瀛。最显达的朱国桢可以增祀,那么其他列代前贤都可以增祀了。于是沈登瀛回家,从各种史传、地志、诗文中把南浔历代人物事迹——录出,然后备同人采择,这样才有了一个三十五人的大名单。后来沈登瀛为这三十五人名单作过几篇文章来叙其缘由,回顾朱国桢以南浔“三百年无一人祀于学宫,深以为耻”故

事,深痛从朱国桢至今二百年,南浔还没有人祀于州府学宫。但是话锋一转,他说这个还不算什么:

然浔不以为耻者,盖有可祀之人,虽不祀,不为耻。不当祀而祀,则祀之愈增其耻。乡贤之设,其初举也,至严至重,故入之者以为荣。后世徇私滥祀,有志之士,几欲奉其祖、父之主以出者,是以得祀为耻矣!^{[12]41b}

这近乎告诫后世,不得滥祀,尤其不得徇私将自己的祖先入祀。沈登瀛的告诫后来颇成现实。二十多年后,大约到同治后期,第一批参与私祀的人凋零净尽,南浔经历太平天国战争后,繁华市镇转眼灰飞烟灭,镇上的房舍除百间楼一带尚有残余外,几乎都毁灭殆尽,私祀活动也停办十余年才再度恢复。恢复后主持此活动的,是吴汝雯的儿子吴春藻。吴汝雯是贡生出身,生前追随者甚多,^{[5]卷21,2b}延及其子,所以参与私祀活动的人数也不少。但是当吴春藻提出要增加私祀对象的时候,竟然遭到同人反对,纷纷辩难,“啧有烦言”^{[5]卷16,8a}。吴春藻写诗说:“我本前贤弟子列,愿为游夏赞辞难”,^{[5]卷16,8a}以慨叹自己的主张得不到一致赞同,又无法统一大家观点。但是吴春藻获得成功的一点,是将其父亲吴汝雯增列入了乡先辈行列,接受私祀。而又过了三十多年,吴汝雯也被蒋锡柛列入“不协祀典”范围。

三、私祀的局限性及其标准

南浔文人私祀活动,客观上建构了地域精神史。历史的发生是以书写叙述为载体的。而怎样叙述、叙述什么、由谁来叙述,则在于权力者。早期的历史书写权力,是由王室权贵控制和垄断。春秋以后,这种权力逐步下移。宋代以前,因为文献依靠传抄,对于历史事件的描述基本呈现一种版本,人物的忠奸善恶,大多也只有一种面目。而随着雕版印刷的广泛使用,传世文献增多,可以给后世呈现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诸多种描述,广泛传播也成为可能。于是文人抒发愤懑,褒贬世情,纠合同人,建构历史,为此获得了臧否人物、论断是非,甚至主宰描绘历史的权力。比如,南宋湖州城里有个叫沈瀛的诗人撰写了《旁观录》一书,专门记述湖州人的各种状貌,针砭

①朱国桢谥号文肃。

时弊,揭露他人负面信息。为此,很多人见了他不愿开口,生怕被他写进书中加以丑化。^①而通过褒贬人物,文人也获得了构建地方精神史的权力。

地方重视历叙人物,模塑历史,体现了地方文人对于地域精神史构建的自觉。晚明南浔镇及周边相距不足十里内,就产生了温体仁、沈淮、朱国桢三位内阁首辅,董份、沈演两位六部尚书,^②政治明星闪耀一时。虽然“居民数万家,诗书之盛”和乌镇仿佛,但是乌镇早已有志书,而南浔却空缺,这让朱国桢非常惋惜。^{[11]卷64,3下}随后不久,年方二十岁的董说就辑南浔史上44位名人著述为《浔书》,欲表彰先贤,刻意总结撰述南浔历史。可惜此书亡佚,传世的仅有一篇自序。^{[12]卷47,12-13a}尽管清初开始有潘尔夔、夏光远、陈可升、庄学德、张鸿儒、方熊、方焘、董肇镗、范来庚等人接力辑文献,并撰述为《南浔镇志》。^{[5]卷47,13a-14a,21b-22a,22a-23a,23a-b,23b-24a}张鉴和挚友范锴年轻时也曾特别留意辑录乡邦文献。^③这些文人的不断努力,为地域精神史建构提供了材料。

“任何秩序下的参与者都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5]3}1830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南浔小镇经历了上海开埠贸易带来的丝业繁荣、太平天国战争、战后丝业再度繁荣、留洋潮流、办学风潮、同盟会反清活动、辛亥革命等等数不清的重大事件,其间也出现过很多显赫官员、巨商富贾、革命党人、学士才子。但仔细考察南浔百年私祀人物,将其放置在南浔镇丝业外贸极为繁荣的历史大背景下审读,会发现被20世纪80年代“市镇研究”热以来津津乐道的“四象八牛”之类富商^{[5]183},当时根本就没有被列入私祀考察范围。

从1830年到1937年私祀活动停止,对南浔产

生最深影响的,莫过于由于丝业外贸出现的一大批富商。徐珂在民国初年记录说,南浔“镇多丝商,同光间之繁富,甲于浙中。数富室者有‘五虎六羊八牯牛七十二只焦黄狗’之喻,其最富者逾千万”^[14]。周延年也指出,南浔丝业全盛是同治初期。^④汪曰桢撰同治二年(1863年)刻本的《南浔镇志》,为77名本土人士列正传,其中以富人身份入传者仅一人,因其“好施予人”,^⑤而到民国九年(1920年)刻竣的周延年撰《南浔志》,计有184名本土人士列正传,其中承袭旧传一人外,道咸以来仅9名富商得入其列。^⑥可以揣测,周庆云因自身也兼有商人身份,故而不惜用各种华丽辞藻洋溢着激情对富商行善德行予以赞颂,如刘镛捐资赈灾,朝廷钦赐建造“乐善好施”牌坊,陈煦元、张颂贤及周、梅、蒋、庞、顾、金家等子孙数代,也都有过慷慨解囊赈济乡民的善举,即便如此,商人在人物正传所占比例也不足20%,而在文人的私祀乡贤牌位中,更是没有他们其中的一个名字。在文人私祀的地域精神史想象中,显宦尚且存在争议,而商人就根本不入其法眼。

历史是一种选择性书写叙述,有时甚至会网漏吞舟。当然这种选择性叙述,自有自身的价值定位。晚清南浔私祀的地域精神史想象,与客观的历史并无直接一一对应关系。即使涉及顶礼膜拜这样严肃的事件,也仍然会出现“追述远代,代远多伪”^[15]之弊。比如,乡贤祠中张洪的履历,其《家谱》载其生活在弘治、嘉靖时期,殉难于倭寇之乱,而旧的地方志则称其洪武朝举贤良,登明伦堂,“触柱死”,为元朝殉节。^{[3]卷10,10a}这记录前后相差一百年,或前后各有一张洪,或其一必出于子虚乌有。因而,很难推断

①杨万里为此撰诗,称:“逢著诗人沈竹斋,丁宁有口不须开。被渠谱入《旁观录》,驷马如何挽得回。”杨万里:《题沈子寿〈旁观录〉》,《诚斋集》卷30,《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60册,第327页上栏。

②清人总结为“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温体仁家乡在南浔镇南七里处一村落,沈淮、沈演家乡在南浔西南十里的马腰村,朱国桢、董份则属于南浔镇人。见文后参考文献[9],第33页。

③张鉴为范锴的《浔溪纪事诗》作序称:“余牵率举业,或得一编值有关浔事者,辄怦怦为之心动,白舫则直刺取其所得以归己。”见文后参考文献[9],第3页。

④周延年指出:“吾镇丝业,以同治初年为全盛时代,以此起家致富者比比皆是。”见文后参考文献[2],卷2,第8页b。

⑤见文后参考文献[3],卷12,第12页a。此外谢洲虽然“托业贸迁”,但入祀主要原因“多与名流往还”、“工诗古文”。见文后参考文献[3],卷13,第20页b。

⑥九人为顾福昌、张颂贤、陈煦元、梅宝楚、朱兆传、金桐、刘镛、周昌福、周昌大、庞云鎔。见文后参考文献[5],卷21,第1页a至第27页a。

私祀群体所祭祀的究竟为哪一个张洪。而早期私祀对象中“寓贤”太多,其中如王毓耆、张隽,甚至后来没有被列入《南浔镇志》“人物”卷。对此,汪曰桢特别说明其“偶尔托足,未尝久居于浔,故并不录篇中”^{[3]卷14,10a},意谓他们连“寓贤”都算不上。至于私祀对象的标准称“达者不与焉”,实际上穷达都是相对而言,很难设定规范。而且为了祀朱国桢而将董份等人也一并列入,破坏了祭祀所既定的价值标准。更可能为人诟病的是,道光八年(1828年)最早参与私祀活动的十人去世后,有九人被列入私祀对象,这显然太过私人化。

尽管南浔私祀标准有未必规范的瑕疵,后人不得不用“不协祀典”加以屏蔽。但是他们精神史建构的努力并未因未必绝对客观而受轻视。最早的祭祀活动以及中断十余年后再度恢复,都称作“祭乡先辈”,^{[5]卷16,2b}到宣统时期称“乡贤祠”,^{[5]卷16,5a}而到抗战爆发前已称作“先哲祠”。^{[2]卷2,24a}从后期越来越得到社会广泛认可来看,私祀乡贤活动不仅得到承认,而且越来越神圣化。

建构历史并被载入史册是一种小概率的事件。从摈弃商人群体进入私祀对象,可以分析商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最为今人称道的晚清商人捐助赈灾行为,很多是因为功利目的,比如为了朝廷封赏和捐纳,或由于地方官员借势凌逼,不得不拿出钱来。所以,他们的捐助行为背后未必都有高尚情操在。直到20世纪初,愤世嫉俗的南浔文人在描述南浔商人的社会地位时还写道:

南浔商人,对于合镇一切公事,但认出钱之义务,而无掌柄之权利。各趋其业,各安其故,守分营生,不他事事。有时因钱债之细故,口角之微嫌,为官董所鱼肉,虽至大之行业,忍气吞声,破财省事,此似喂猪狗之豆腐渣,任人践踏而不惜者也。^①

传统中国专制社会中的商人对政治权力具有极大的依附性,获利由之,破败由之,因此不能简单比照西方近世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不能否认清代商人中有仁厚道德君子存在,他们愿意积极出资赈济贫弱、捐助灾民。^②但是清代商人的大型赈灾捐助行为大多和获得预定的封赏职衔以及官府的逼迫密切相关,因此其动机也多了一重复杂性。^[16]从此结论,文人们描绘地方精神史时摈弃商人的存在,也就有所依据了。

纪磊当年的论品学的主张有一定的影响。汪曰桢曾写诗论及私祀的乡贤形象,称:“有以气节著,有以文艺鸣。穷者为隐逸,达者为公卿。要皆三不朽,无愧乡先生。”^{[17]644}上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在这些小众化的文人^③看来,可以入祀者,不仅要品德高尚,还要有“立言”的学术成就。最早入祀的三十五人中,仅有六人没有著述。而后来增祀的十七人,几乎人人学有专长。沈垚曾经在悼念纪庆曾的文章中,回顾同人各擅所长时说:“金坡治明史,愈愚攻古文词,介眉旁涉百家言后专治《通鉴》,山甫善诗赋工笔札,思诒则识解绝人伦,古今得失、儒术纯疵,口若悬河,闻者为之色骇。垚与诸君过从相质证,诸君皆志锐气盛。”^④除这里所述沈登瀛、孙燮、盛朝勋、金锡桂、纪庆曾之外,沈垚、丁桂、许旦复、纪磊均有著述,除吴钧台不可考外,连后来被蒋锡珩排除在外的吴汝雯,也曾有著作《世说新语校定》九卷。^⑤可见,这个文人团体是有学术追求的,他们在设立私祀对象的时候,潜意识中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影响。

保罗·康纳顿曾经想论证“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13]其认为“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13]。

①来其氏:《豆腐南浔》,南浔通俗报,1905年3月15日,第13、14期合刊,转引自文后参考文献[9],第194页。

②刘锦藻曾记述太平天国战争后,其父刘镛自上海避难回到南浔,每年年终散给乡民“米票棉衣”,至于“男妇喧阗,除夕至不能闭户”。显然这与捐纳无关。刘锦藻:《先考通奉府君年谱》,清刻本,第17页a。

③孙燮曾经非常清醒地分析参与私祀的群体是“乡里人所笑为迂而不欲近者”。孙燮:《妙境庵祭乡先辈记》,《愈愚集》卷6,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怡颜堂刻本,第17页b。

④沈垚:《纪思诒事略》,《落帆楼文集剩稿》卷1,《聚学轩丛书》第5集第15种,民国贵池刘世珩刻本,第27页a。其中沈登瀛字金坡,孙燮字愈愚,盛朝勋字介眉,金锡桂字山甫,纪庆曾字思诒。

⑤后来此书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毁于战火。见文后参考文献[5],卷16,第8页a。

精神史叙事的发生常常有自身的观照在其中,把自己的意志和追求附会在历史人物身上,是叙事者常用的手法。孔子写周公、司马迁写屈原,莫不如是。

四、私祀群体的影响和地位

距离1830年张鉴绘制《精庐小集图》二十八年,汪曰桢再度摩挲旧画,感慨时事。此时张鉴已去世八年,沈登瀛已去世十七年。汪曰桢用一首长诗回顾了私祀活动的产生过程和意义,诗中说:“其名曰私祀,其实乃公评。此举系风化,矩范式里閤。”^{[17]644下}多数参与私祀活动的人,都留下了诗文记述,在论及私祀意义的时候,他们一致指向了风化地方、树立典型榜样、规范士人言行等功能。祭礼过程并不复杂,焚香烧纸,烛影摇曳,贡品杂陈,然后排列有序的文士们神情肃穆地跪拜,一般还会有人宣读祭文。祭祀礼仪结束后一起饮宴,交谈中最热烈的话题,是追忆前贤往哲的事迹言行,这种交流最后结论为互相告诫:努力修行持身,绝不做前哲为耻的事情。^①膜拜前贤的仪式中追远怀人,“序拜以齿,饮宴以礼,陈说古今,讨论学业”^[18]。由于士风士习得到锤炼,地域精神史在不断彰扬前贤美德的同时也得以树立起来。

民国六年(1917年),刘锦藻曾回忆说:“浔于菰城东仅弹丸地,嘉道间作者林立,经史词章著述甚夥颐。”^{[19]2a}私祀活动砥砺士人德行修养的同时,也促进其群体追求学术成就。道咸时期,南浔学人学术达到极盛。杨凤苞、施国祁、张鉴入诂经精舍,并与稍晚的沈垚^{[20]6325}、纪庆曾^{[20]6364}、汪曰桢^{[20]6785}等都列名《清儒学案》,且沈垚为“敦三学案”之案主,沈登瀛、董蠡舟、纪磊、温日鉴、孙燮、丁桂、金锡桂等皆学有专攻,有著述传世。这十余人成为一个颇具实力的学术群体,其学术方向和特征是由经学转向史学,由训诂微言大义转向探求经世致用。如施国祁之于金史、张鉴之于西夏史、纪庆曾之于经史、沈登瀛之于地方史、沈垚之于边疆史地以及董蠡舟、温日鉴的三国、南北朝史学研究,都有相当的成就。最年

轻的汪曰桢则耗毕生心力撰《二十四史月日考》,^[21]成为一代佳话。这个学术群体交游甚广,所涉南浔及周边如计然、严可均、范锴、温一贞、董增龄、陆长春等等,他们学术旨趣相互影响,著述甚丰。

私祀群体对于科举的态度,颇耐人寻味。一方面他们推崇不屑于科举的文士,追求学术、学养和道德文章,不愿做八股文的奴隶;另一方面则纷纷参加科举,耗费大量精力,甚至为此终老其身,客死他乡。其中最具号召力和影响最广泛的“南浔三先生”^{[22]卷4,14b}都只是秀才,施国祁直到四十岁以后才放弃科举,杨凤苞同样屡试屡败。纪庆曾为此付出的代价更惨,因为不屑于科举,设馆所获学费不够其生存,不得不外出学幕,学而不得,归里即病卒。^[23]孙燮在送沈垚赴杭乡试的文章中说:“工制举业者,往往不能通经,而通经之士,其制举未必过人,或反不及焉。”^{[22]卷3,10b}因为这种思想极为普遍,晚清南浔士人虽则重视科举,但并不以此为成败。也许正因为此,从道光末年(1850年)到清亡的蚕丝外贸繁荣期,南浔不过只出了三名进士,平均二十多年才出一人。^{[5]卷27,2b}

南浔士人跟商业、商人的关系也很微妙。一方面,商人依附政治权力赖以生存,追求垄断经营;^②另一方面,士人随时可能通过科举手段,短期内转换身份,成为权力掌控者。所以商人给予贫寒士人优渥待遇,洁身自好的士人则对商人不卑不亢,努力保持自己的人格地位。有功名的士人还可能被商人请去商号做董事,以应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晚清的小报描述说:“南浔无所谓董事,所谓董事,朝来暮往,蹀躞不嫌,三飧果其腹,以不联绅富为独立,百千贍其家,以不营公益为知己。此为士流之变相。”^{[9]194}施国祁当年放弃科举后加入商贾行列所为,即近似于此。

自道光后期通商之后,士人与商人之间关系更加密切。士人经商者大有人在,士商身份已经相互兼容或很难区分,很多士人投资直接参与经商。但还是有

①孙燮诗中写到:“魂招桦烛影,人拜纸钱风。如见先儒貌,惟凭我辈衷。”又:“事毕还留饮,谈深欲启蒙。恐贻前哲耻,相约慎持躬。”见《己丑正月十五日同人集妙境庵祭浔上诸先辈得长律二十韵》,见文后参考文献[5],卷16,第7页a-b。

②如民国初年南浔旁边的松亭村出现一个茧行的时候,浔商梅恒裕致电省巡按使公署,巡按使公署立刻申飭吴兴县立行封禁。见文后参考文献[9],第215页。

所不同。清末曾有人把南浔商人按照等第比喻为五种豆腐,^{[9]194}除前述的“土流之变相”的为“变色豆腐”外,还有坐拥巨富的“本色豆腐”,奔走绅富之门掌其业以取膏脂、瞻身家的“油豆腐”,癖嗜烟霞、肆行敲诈的“臭豆腐”,为官董鱼肉、忍气吞声、破财省事的“豆腐渣”。其中“变色豆腐”被认为士人本色,而“油豆腐”“臭豆腐”则属于土流“上下两等”。但是,上层士人还是有本能的对于道德的坚守。《李氏宗谱》中记录说,太平天国战后,南浔遭遇饥荒,一名商人在士人家中议论,建议储积米粮不售以待高价。士人尚未答话,帘后其母开腔回应,称:“年荒米贵,比户啼饥,君即获厚利,于心安乎?”商人只能“嘿然,逡巡,去”^{[5]卷58,14b}。可见,士人清流家风之于商贾射利的区别。当然土流之被喻为“油豆腐”“臭豆腐”的则不在此列,且永不会进入私祀圣殿。

商人对士人始终持有十分敬重的态度。19世纪50年代开始富裕起来的浔商,其家族子弟大多以读书为正途,刘、庞、张、顾、周、梅、金、蒋、邢等家族的第二代富商子弟就出现了举人、进士或较多的秀才、贡生、监生。到1885年前后,第一代浔商渐次去世,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代浔商从富商身份转换为绅商。^①南浔绅商群体多生在六七十年代,很多人醉心著述。如富商二代刘锦藻中进士进入仕宦阶层后,著《清朝续文献通考》400卷,其为“立言”付出的心血令人吃惊。汪曰桢在世时多次想刊印南浔地方先贤著作为《南浔丛书》,^{[19]2a}但终世也没有完成。到晚清民初第三代浔商如张石铭、刘承干等则竭力搜求私祀学人的著述手稿,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刊印,并且做跋文提要,表彰其学术,收入《适园丛书》《吴兴丛书》,实现了汪曰桢的愿望。私祀学人如纪磊、纪庆曾等多数人都是依赖这些富商在其去世后几十年里崇仰先辈,慷慨解囊,著述才得以传世的。可见,私祀群体在绅商时期依然保持了崇高的社会地位。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的思维和行动越来越激烈。南浔的青年学子打毁了城隍庙贤圣殿及广惠宫神像,而守旧的士人则出来反对,乃至争讼到省城。争讼双方甚至是至亲的甥舅关系。^{[2]卷2,24a}尽管如此,那些激进的青年学子,还是对乡先辈们表达出最大

的恭敬态度,已移至报国寺文昌阁楼下的先哲神龛,在打毁城隍庙神像以后,反而被供设在城隍庙正殿,享受更大的排场。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南浔沦陷,庙被伪军拆毁,^{[2]卷2,24a}私祀活动才最终画上句号。

五、结论

关于明清市镇研究的关注点,大多以经济形态为核心来扩展。作为一个不断被提及的显例,南浔提供了很多作为样板的案例。樊树志曾论及江南市镇民间信仰为形式的迎神赛会,体现地域的经济繁荣、社会富庶。^[24]作为商业极为繁荣的市镇,其地域精神史建构有何意义?笔者以为,江南市镇的文人参与权力分配的制度性架构(比如科举),借助国家权威性的思想资源(比如经学),从而建立起以维护皇权为特征的地域精神史,实现了皇权统治在江南经济发达的市镇细微化渗透。杨国桢曾指出:“虽然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活动相当活跃,对自然经济的瓦解作用却相当的微弱。”^[25]而透过南浔的个案,可以解析在“政治权力、土地权力、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综合体”^②之外,透过商人的地位和文人之间的互动,地域文人在地方社会思想建树上,也不遗余力地做着维护旧体制的帮手角色。这是江南市镇繁荣而难以走出结构性困境的思想性因素。当然,地方社会也给予私祀文人群体以极高的社会地位和褒扬,从而建构起封建政权在基层的主流价值观。

【参考文献】

- [1]左丘明.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1:37.
- [2]周延年.南浔镇志稿[A].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1950.
- [3]汪曰桢.南浔镇志[Z].刻本.1862(清同治二年).
- [4]王钦若.册府元龟:第86卷 赦宥[M]//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0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568上.
- [5]周庆云.南浔志[Z].刻本.1919(民国九年).
- [6]乾隆.绍兴府志:第56卷[M].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75:1376下.
- [7]蒋锡珩.南浔私祀乡贤祠记[Z]//民国刻本.周庆云.浔

①也有学者认为,南浔第一代富商捐官后有了身份,已可叫做绅商。参见郑卫荣:《清末南浔绅商群体崛起的历史再现》,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第124-126页。

②傅衣凌论中国封建地主制的社会经济结构时所论及此。见文后参考文献[25],第1-2页。

- 溪文征:第13卷.
- [8]沈德符.野获编:第13卷[M]//影印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7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69,下.
- [9]范锴,刘正武.浔溪纪事诗 续浔溪纪事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 [10]沈登瀛.沈柳堂文集 南林乡前辈私祀录序[Z]//民国乌程张氏刻本.张钧衡.适园丛书.1916(民国五年).
- [11]董斯张.吴兴艺文补:赵征君传[M]//影印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2]沈登瀛.沈柳堂文集 精庐小集图跋[Z]//民国乌程张氏刻本.张钧衡.适园丛书.1916(民国五年).
- [13]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
- [14]徐珂.天苏阁丛刊 可言[M]//影印本.丛书集成续编:第91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1133,上.
- [15]刘勰.文心雕龙注:第4卷[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86.
- [16]赵晓华.晚清的赈捐制度[J].史学月刊,2009(12):65-69.
- [17]汪曰桢.玉鉴堂诗集:第5卷 题精庐小集图六十四韵[M]//影印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54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8]丁桂.精庐雅集图记[Z]//民国刻本.周庆云.浔溪文征:第10卷:9b.
- [19]刘锦藻.刘序[Z]//民国刻本.周庆云.浔溪诗征.
- [20]徐世昌.清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1]汪曰桢.二十四史月日考[M].稿本影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 [22]孙燮.南浔三先生传[Z]//清道光刻本.愈愚续集.
- [23]孙燮.纪半虔哀辞并序[Z]//清道光刻本.愈愚后集:第3卷:24a.
- [24]樊树志.江南市镇的民间信仰与奢侈风尚[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09-118.
- [25]郑振满,郑志章.森正夫与傅衣凌、杨国桢先生论明清地主、农民土地权力与地方社会[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1):4-13.

(上接第69页)

[参考文献]

- [1]邓思清.刑事被迫诉人的地位、权利与保障[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
- [2]苏惠渔,孙万怀.论国家刑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3]李旭.论有利被迫诉人原则[D].长沙:中南大学,2009.
- [4]童建明.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
- [5]林喜芬.中国确立了何种无罪推定原则:基于2012年刑法修订的解读[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1):130-136.
- [6]陈莹莹.新刑法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兼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比较[J].西部法学评论,2013(4):15-22.